



■本期关注：出版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

构建中国特色世界领先的出版学理论体系

□柳斌杰

构建中国出版学理论体系正当时

2022年9月教育部印发的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出版学”首次单列，明确可授予出版博士专业学位。2023年12月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实施意见》。这些文件为推动出版学科建设、出版业繁荣发展和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持。这就为出版学理论的构建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出版是留存记忆、表达思想、记录历史、传承文明的大事业，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需求，也是几千年来人类探讨的课题，但始终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至今处于有论无学、有学无论的状态。这

次会议，大家聚焦出版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人才培养体系，是一个历史性突破，将会使创造了印刷文明的中国再度为人类精神生产和传播作出新的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文明新形态的布局逐步完善，在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新发展。特别是“两个结合”的理论，打通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融合发展的路径，解决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100多年争议不断的中国文脉问题。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第二次思想解放的“两个结合”思想，使我们能够从几千年印刷出

版的实践中提炼出与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相通的出版理论和创造出中国特色的出版学理论体系，引领世界的知识生产和知识服务的总方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就对学科体系建设提供了大环境，新闻出版学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基础性、支柱性学科，理所当然要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来帮助人民深化认识、掌握规律。

对于教育和人才培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作出了决定：一是“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

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这是从文化强国建设角度提出的。二是从教育、科技方面也对人才培养提出明确要求。“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三是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这些决定，是要在5年内完成的，这就增加了出版理论体系建设的紧迫感。所以，我认为构建中国出版学理论体系正当其时。

出版学理论体系建构要遵循三个原则

出版是文化的基础，是知识的宝库，是人类思维生产的最优质的数据。在几千年的实践过程中，经历了原始出版、印刷出版、数字出版，现在进入了人工智能出版，已经形成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和基本经验。这其中包含了基本的原理和规律。所以该坚守的要坚守，该发展的要发展，该创新的要创新。

关于坚守。出版的功能要坚守，记录历史、保存记忆、传承文明、传播真理，普及科学、资政育人、互鉴文明，这是永不改变的，也是区别于不同行业的边界，必须在理论上坚守。出版的

价值要坚守，有知识含金量的历史价值、记忆价值、文化价值、学术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传承价值、人文价值，永远是出版行业的尊严和丰碑。也不能因为技术、业态、使用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一定要在理论上加以坚守。

出版人才作为知识的加工者、历史的裁判者，必须坚守做人做事的品位，要有天下为公的大情怀、要有科学严谨的好传统、要有为真理而牺牲的勇气和担当、要有为人民服务的专业修养和能力。在新质生产力迅猛发展的时代，也要塑造和坚守，

必须加以理论上的系统化教育。

关于发展。从历史上看，中国出版的理念最早也最丰富。留存记忆的遗址10万年前就有，生产力水平不同，出版方式、载体也不同。黄帝时代记言记行就有分工记录，殷商就有记录文字“有册有典”“化民训官”。到了春秋战国就有了“不学诗无以言”“不读礼无以序”，教书育人就兴起来了。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和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最能代表中国知识分子著书立说的胸怀和使

命，大体与习近平总书记讲的立心、立命、立德、立魂一脉相通。国外情况是，出版方面也有闪光的思想，例如，古希腊的记忆研究，首开学科。英国弥尔顿《论出版自由》，成为经典。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这些出版理论，明确地指出：“没有出版自由，人的一切自由就成了泡影”“没有出版自由，工人运动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而“出版自由”成为世界所有国家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列宁讲“出版是党的革命武器”。因而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早期共产党人都是用出版作为革命武器，唤醒民众、发动革命的。如今是现代化时期，由于社会进步、技术发展、出版生产力的变化和阅读方式的转变，原有的理论需要发展，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关于创新。理论的源泉是创新性实践，实践发展了，理论必须创新，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就出版学理论创新而言，我们应当有原创性、前瞻性的理论观照我们的历史文明和未来前程。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时代化，继续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出版工作和出版实践，深入研究现代出版的原理性、规律性、真理性的理论，深化对出版学教育体系、课程体系、教学体系和叙事、话语体系的研究和实践，尤其要把握出版新质生产力带来的出版新业态新形态所引起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使用关系的新变化，创新融合出版的理论体系。



“中国出版学理论体系构建”研讨会现场。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供图

中国出版学理论构建的重点方向

从理性的角度思考，出版学理论构建的重点应该是六个方向：

一是以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为灵魂，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和中国化、时代化，特别是把习近平文化思想和文化强国五项任务融入出版学理论，作为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的基础理论。

二是加强学科原理性的理论构建，使学科有个扎实的基础。例如，目前讨论的定义域“精神形态的内容与物质文化的载体完美结合的知识产品生产过程”和“文化、思想、理念、科学等精神形态物质化传播的生产工艺”这些思考，都是深化了对出版的认识。

三是加强经验性的理论概

括，充实实践的理论表述。毛泽东同志讲过“道理就是经验”。经验的知识价值就是理论的创新之源和检验之果，特别是中国造纸、印刷术两大发明领先世界各国，数字出版也成果颇丰，应当有个理论升华。

四是加强学理性的出版学理论创新。出版学迟迟不能列入单独学科，学理性研究不足是难点，而只有实用操作性的知识传授。建立学科必须有学理性研究支撑，就是要用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研究出版实践、出版认识、出版知识，研究出版链条上的作者、编辑、出版、发行（平台）、市场交易者、读者相互的关系，及其成为价值共创共享的机制，形成一些有影响的标识性概念和逻辑

体系。

五是加强出版理论的真理性的研究，找出出版学的真谛和内在的规律。各种学科的最高追求是发现规律、认识真理、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也是这样，你的真理要素越多，你的研究价值越高，就更能够帮助人们指导实践，解决时代和人民提出的问题。比如主题出版问题、智能出版问题、出版自由问题、著作权问题、高低低评价问题、出版融合问题、阅读场建设问题，不是完全靠政策能解决的，要从理论上解决。

六是拓展相关学科理论。作为出版学理论体系，还应当拓展相关学科理论视野。除了元理论、基础理论、专业理论，还要多层次、立体化丰富理论体系。例如出版经济学、出版工程学、

出版制度学、出版管理学等交叉学科的理论也应当列入构建内容。这样才能是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

总而言之，构建中国特色、世界领先的出版学理论体系，必须站在时代的新起点上，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从事理、道理、学理、真理几个方面深入，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协同研究，构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再由学科理论指导创新学科体系和教学体系，培养数智时代拔尖出版人才，把理论转化成物质力量。

（本文作者系十二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本文是作者近日在河南大学、郑州大学、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中国出版学理论体系构建”研讨会上的讲话。）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学院与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开展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交流。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学院 供图

以出版学科高质量发展 助推出版人才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张君成 实习生 王雪坤

出版学科专业建设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如何构筑中国出版学专业的自主知识体系，打造有利于出版学科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的良性机制，共谋出版学科专业建设与创新发展的新路径，多年来始终是学界、业界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

由于技术发展的需求、基础研究的需求以及高水平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促使业界与学界携手，共同探讨合作共建的有效机制。2024年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交流会近日在京举办，与会嘉宾立足当下实践，展望未来发展趋势，为创新出版学科专业共建机制提出了诸多具有前瞻性与可行性的思路与方案。

创新出版学科专业共建机制

中国出版学理论体系建构是出版学科专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充分融合其他科学优势成为关键。全国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专家组组长万安伦表示，在学科定位上，出版学是一门大交叉、大融合的新文科。在万安伦看来，作为新文科，出版学既保留了传统人文学科的核心，又融合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内容。例如，文史哲等人文学科为出版学提供了文化与思想资源；经管法为出版学带来了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律视角，尤其是在版权管理和市场运营等领域；工学则通过印刷技术、数字化手段和人工智能推动出版技术发展与转型。“这种多学科交叉的特性，既拓宽了出版学的研究范围，也提高了其服务实际需求的能力，因此我们在构建中国出版学理论体系时要着力吸收其他学科优势，做到充分融合。”

中国的编辑出版学一定要吸收中国编辑出版优良传统。人民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黄强表示，从孔子删诗到敦煌遗书，中国古代形成了注重典籍和严谨编校的传统。这些经验为现代编辑出版学的构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源。这种吸收融合也表现在新业态方面。武汉大学出版研究院院长方、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方卿表示，出版新业态成为推动出版革新力量，它的研究发展需要在中国出版学理论体系中有体现。在方卿看来，AR/VR、元宇宙和AI出版等业态尚在探索阶段，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黄强表示赞同，“数字化改变了出版的介质与传播形式，但编辑的核心职责仍在于文化选择与传播。编辑出版学需要纳入融合出版与数字出版的研究范畴，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文化传播能力。”

实践为理论的发展提供支撑。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林福燕介绍，通过学科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从三方面推进出版学科共建工作：以“名编辑培养工程”为抓手，完善高素质编辑人才培养机制，通过产学研用结合，构建从理论到实践、再反馈理论的编辑成长路径；以国家出版智库为基础，建立科研课题联动机制，集中力量突破行业关键问题，促进理论研究与产业实践的融合；以河南省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创新联合体为平台，打造多元汇聚的

产业生态，联合国内外高水平企业与科研机构，推动出版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构建优势互补、特色鲜明的出版产业集群。

培养出版高层次人才

出版业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础之一，出版专业博士的培养旨在为实现出版强国、文化强国目标提供高端人才支持。不少专家学者也开始关注探索数字时代背景下出版专业博士培养的新路径、新策略。

北京印刷学院副院长陈丹表示，《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2035年建成出版强国，这为出版博士培养提供了政策支持。教育部和中宣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高校培养“引领型、复合型、专家型”出版人才。

在陈丹看来，在行业发展层面，出版业正在经历数字化与国际化的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在出版业的应用广泛，但仍面临高投入、数据安全和技术选择等问题。为解决行业痛点，北京印刷学院构建了出版学交叉学科平台，围绕内容生产、呈现和运营的关键问题，通过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推动技术研发与应用落地。“未来出版专业博士培养应注重与行业实际需求相结合，基于出版学交叉学科平台，真题真做，从项目产出成果，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陈丹表示。

正如前面所言，出版学作为新文科，培养模式需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对此，万安伦表示，出版专业博士培养，通过跨学科合作推进出版领域的价值理念、方法论和逻辑体系的构建，并在实践路径上加强出版学科专业共建，优化教材与教学方法，强化数字技术与智能技术的教育，培养复合型、国际化出版人才的培养。建立长效评价与反馈机制，确保培养质量，避免人才培养流于形式。“在全球化和数智化背景下，出版专业培养不仅要满足行业需求，还须助力中国特色出版业的发展和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

培养出版专业博士需要开放且灵活的标准，避免培养方式过于固化。对此，上海教育出版社社长缪宏才认为，专博培养应注重复合型、国际化出版人才的培养，强调数字能力与专业能力并重。“出版专业博士必须具备政治能力、语言能力和数字能力，同时能够运用数字工具解决实际问题，但不需成为技术专家。此外，培养方案应结合实践，强调跨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例如出版与工科、艺术、国际视野的融合。”

出版专业博士的目标是为行业培养高层次人才。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全国出版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志强表示，培养的学生须兼具学术情怀与出版情怀，以实现学科服务行业的理想目标。同时，出版博士教育需与时俱进，关注出版领域的创新需求，尤其是行业转型与数字化背景下的实际问题。